

柏格理教育思想 百年回眸

◎ 周遐年 苑青松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柏格理教育思想百年回眸

周遐年 苑青松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柏格理教育思想百年回眸/周遐年, 苑青松著.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7-5601-4616-4

I. 柏… II. ①周…②苑… III. 柏格理-教育思想
IV. G40-095. 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5496 号

书 名: 柏格理教育思想百年回眸
作 者: 周遐年 苑青松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刘子贵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5 字数: 210 千字
ISBN 978-7-5601-4616-4

封面设计: 聪聪
咸宁市建雄印刷厂 印刷
2009 年 8 月 第 1 版
2009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前言

贵州省在一般人眼里可能只是一个贫穷落后的代名词,但只要你身体力行地去探索,你仍然会获得许多宝贵的、意想不到的、有意义的东西。笔者在贵州调研的时间里切实感受到了这一点,深刻体味了它的丰富和多彩,百年石门的教育资源便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石门坎,一个苗族村寨,因为寨前通向涧底的一些破损石阶,取名叫做石门坎。这个要在五十万分之一的贵州省地图上才能标出名字的苗民小山村,地处中国贵州威宁、云南昭通、彝良三县交界处,东与云贵、龙街两乡接壤,南与黑土河相依,西北距云南昭通 30 余公里,东北距云南彝良 60 多公里,属贵州省威宁县,距离威宁县城 142 公里,石门坎总面积 143.54 平方公里,居住着苗、彝、汉、回、布依等 6 个民族,约 15000 人。

过去的石门坎地势偏僻,山高坡陡,万壑纵横,嵬嵬险峻,且林大兽多随时可见,谷深雾浓终日不散。冬季冰凌蔽天,雪厚尺许;秋天细雨连绵,道路险恶,交通十分闭塞(1975 年才通公路)。由此可知,石门坎环境恶劣、稼穡艰难。石门坎《溯源碑》曰:“天荒未破,畴咨冒棘披荆,古径云封,遑恤残山剩水”。

石门坎的居民纯系一种花苗,俗称大花苗。苗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之一。据文史资料记载,距今 5000 多年前,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一带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部落联盟,与以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发生冲突,在涿鹿大战中九黎败北,蚩尤被杀。九黎部落部分融合于炎黄部落,另有相当大的部分向南迁徙。到了尧、舜、禹时期,

定居于江汉平原的九黎遗属又发展起来,形成了新的“三苗”部落联盟。华夏部落不断向“三苗”发动进攻,虽然经过长期的抗争,但是最终在禹的征伐下,“三苗”部落联盟的势力被彻底削弱,并分化瓦解,大部分部落离开江淮和洞庭、彭蠡之间的平原地带,避入山林沼泽,开始向西北和西南山区迁徙。周昭王时期,周朝对苗族部落进行过多次征伐,苗族先民一直经历着大幅度、远距离、长时期的迁徙,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到达滇、黔、川边一带。这部悲壮的迁徙史,通过苗族的古歌《蚩尤与苗族迁徙歌》详尽地反映出来:“古时苗族住在直米力,利磨城的甘骚卯毕领兵进犯直米力;蚩尤败后南迁米城,再迁小米坝,最后来到黄河边,渡河南上五次才成功,定居平坦的花椒大坝子,北方的沙昭觉堵又率兵进犯,迁徙来到底果垒(湖南一带)被逼迫迁到崩崩地;再逃荒躲难来到阿止居地(今贵州大方、黔西、金沙一带)。”在1916年8月10日,贵州威宁石门坎光华小学苗族师生立起苗文《溯源碑》中也有催人泪下的凄沧语句表述:“我们苗族实实际是中国的—个古老民族,祖先们长期住在中原地方。祖先们有歌唱道: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以后变成了荒野的人,国家和政府没有哪一个管理。”

苗族先民迁徙到滇、川、黔地区时,已是一个晚到的部族,这些地区的农田、森林、矿产等生产资料已为当地的汉族地主和彝族土司、土目所占有,这种经过痛苦迁徙并晚到的情境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经济上苗族同胞没有自己的土地、树木、矿产等生产资料,当时粮食亩产量只有三四十斤,农民交了地主的租和还债外,几乎是一无所有。他们吃的是野菜树根,穿的是草衣和生羊皮,住的是岩洞和茅草棚,睡的是燕麦草,盖的是秧被。由此可看出苗族同胞在经济上的拥有量是零。政治上他们整体上成为封建地主、土目的农奴与奴隶,地主和土目随意掠夺他们的牲畜、房屋、粮食及生命,他们只是为地主、土目劳作并被随意驱使的动物而已,根本没有任何政治地位可言。文化上,苗民们没有文字,没有学校,没有书籍,没有一个人读过书,二十多岁的青年数数字还不能过百,真可谓是汉字字盲、汉语语盲和数字数盲。苗族民众的生存环境王树德在日记中给予了真实而形象地描述:—代

又一代的花苗人,为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而遭受痛苦,就好像不断往返游移于汉族与诺苏之间的一叶孤舟,并被汉族和诺苏认为是“大地上无所作为的一群人”,只适于充当他们的农奴与奴隶。由于内向和恐惧,加之被这些更为强大的邻居所包围,苗族就失去了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他们只好屈服于农奴的身份,变成领主的动产,耕种自己居住地的土地。花苗人居住在人迹罕至的、要穿过浓雾方能抵达的群山顶部,长期与外界缺乏往来,眼界狭隘,精神猥琐。他们生活在“沮丧的深渊”之中。就是在这样一个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文化地位极为低下的民族生存平台上,100年前的英国传教士塞缪尔·柏格理创造了教育的奇迹。

塞缪尔·柏格理,亦译作“波拉德”(REV·Samuel Pollard, 1864—1915),出生于英格兰南海岸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同时也是一个宗教世家。他本人是国内外民族史、宗教史及人类学中的知名人士。1887年作为基督教英国循道公会联合传教团的教士来到中国。1904年传教至石门坎时,被那里贫穷落后而又勤劳善良、求学心切的苗族群众所打动。于是,1905年来到贵州威宁县,以石门坎为中心建立学校50所。1915年,石门坎一带流行伤寒病,柏格理在救治患病的苗族群众和师生时被传染医治无效去世。石门坎——这个物质极度贫乏,环境极端恶劣的人间“炼狱”,在塞缪尔·柏格理等一批西方传教士的组织引导下,各族人民尤其是苗族同胞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石门坎成为该地区的教育中心,被称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海外天国”;基督教新教的英国循道公会则将石门坎基地的创始人塞缪尔·柏格理列为包括约翰·卫斯理在内的五大使徒之一;埃利奥特·甘铎理更是把他与拿破仑、卡尔·马克思、卫斯理相提并论。甘铎理在其日记中写到:拿破仑、卡尔·马克思、卫斯理及其他若干人,因为他们的短暂存在而改变了历史。柏格理在中国西南的作为也正如此,他以独特的方法影响到一个时代。这些至尊评价不是凭空而来的,20世纪前叶,在柏格理、张道蕙、高志华、朱焕章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在广大苗族、彝族、汉族同胞的支持下,石门学校培养出了四千多名小学生,数百名高中生及中专生,三十多

名大学毕业生,两位博士生。石门坎人从目不识丁的起点最后达到这样一个高度,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时间只有短短的20年。另外,在这一教育工程中,他们所展示出来的创新精神和结出的创新硕果,更值得我们关注:老苗文的创制结束了苗族同胞无文字的历史,男女同校首创男女同等接受教育之先河,中国人的主体作用、最早的双语教学、推行现代体育、注重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坚持把民族地区的学校办到山寨、大众教育等教育理念和思想,即使放到今天仍熠熠生辉。为此,外国学者至今仍对其在教育方面的贡献做出高度评价:通过这种方式,在两代人的时间里,苗族几乎成为贵州文化的支撑者。

如果对柏格理的成就只看作培养出几个人才,兴办几所学校,那就不免有些偏颇和狭隘。在柏格理以教育为依托进行的乡村改造上,无论是取得的成就还是所经历的艰辛过程,都是震撼人心的。首先,柏格理对苗族同胞虔诚的爱是他成功的基础。为了兴教育、办学校,柏格理多次深入苗族地区了解百姓的疾苦和下层民众的需求,唤醒他们的维权意识,甚至为此而得罪了汉族地主和彝族土目,四次历险,险些丧命。在深入苗族过程中,更是同苗民一样穿草鞋,着麻布,饭糠粃,说苗话,巡苗寨,夜晚无被盖,寒冬无棉衣。他对苗族同胞纯洁无私的爱,深得苗族同胞的信任。由此,他拿到了改造乡村的“钥匙”。其次,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使苗族同胞有了对自由民主的诉求。石门坎的苗族同胞在柏格理到来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就如同汉族地主和诺苏土目的动产,毫无人格尊严可言,汉族地主和诺苏土目掌握着他们的财产和生命,他们生活在“沮丧的深渊”。柏格理利用晚清政府对待洋人和宗教的特殊政策,经常与地主、土目们谈判、打官司,为苗民争取权利,借以改善苗族族群的弱势地位,使得地主土目不再像原来那样肆无忌惮地欺压苗族群众,也为以后的民族和解打下了基础。最后,改革乡村陋习、输入现代文明,引导石门坎的苗族同胞走上了通向健康、文明的道路。柏格理到来之前,这里的文明程度极为原始,酗酒、崇拜精灵、巫师横行、害怕鬼怪、相互畏惧、不规矩地放纵、不讲卫生等等陋习和迷信,耗费着苗族同胞大量的精

力和财力。柏格理来到后,用新颖有效的形式和丰富多彩的内容帮助苗民扫除各种陈规陋习,纯化他们的婚姻结构;用现代医疗知识,为他们治病,破除巫术为他们减轻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带领他们向酗酒和不良行为展开大规模斗争,推倒了备受非议的宿寨房、花房,使不规范的放纵行为得到了改观,直至被清除。在打破乡村陋习的基础上,进而开办了农业推广站、电报代办站、纺织部、孤儿院、麻风病院,修建了游泳池、运动场、足球场等与农村发展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活动场所。

经过柏格理等人的艰苦努力,苗族同胞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果敢自立取代了相当畏缩的任人支配;知识、清醒取代了愚昧、麻醉,纯洁美好的观念支配着人们,苗家人从黑暗的深处向文明的殿堂阔步走来。文化的启蒙,包括教育的启蒙和乡村文化建设,这些更是提升了人们的思想境界,个人的人格尊严、族群的政治经济地位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这些为苗寨的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准备,苗寨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柏格理来到石门坎后,他所带来的宗教教义,教育举措,生活规范,生产技术等等,就好似石子投入湖中激起的一层又一层涟漪,而且,这些新的意识和规范逐渐得到广大苗族同胞的理解和认同,因而其影响和历史意义是长久而深远的。

当然,我们整理和挖掘过去的教育资源,并不是为了向后看或者为传教士个人树碑立传,而是为了给今天的教育改革提供一个别样意义的参照。新课程启动时可谓轰轰烈烈,在理念上确实给人新鲜、明确、有理据的感觉,然而,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教师的观念受制于过去的习惯,教师的素质没有跟上新课程的要求,加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目前新课程的实施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穿新鞋走老路、用新缸盛旧酒”的现象也比比皆是。比如,新课程对知识与能力的关系、三维目标与“双基”的关系、间接知识与直接知识的关系、接受式学习与探究式学习的关系、考试与多元评价的关系、学生与教师的关系、教教材与用教材教的关系、扬长教育与补短教育的关系、表扬与批评的关系等问题有比较明确的提法,但由于缺少可操作性的策略或考

虑到升学的压力,教师在实施过程中仍按照旧的模式教学,新课程实施的效果大打折扣。再如,在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问题上,虽然教师在观念上痛恨唯考试是从的模式,但在教育资源不均匀,评价机制不健全,就业压力有增无减的今天,教师仍不得不实施题海战术,带领学生积极应试。然而,应试的结果造成了学生与学生、学生与家长、学生与教师之间关系的冷漠与畸形,儿童恶作剧、自杀、逃学、行为不端、学校暴力等一系列不良现象屡屡出现。这些不禁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新课程改革从理念到实践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我们怎样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我们也不得不产生这样的思考:在当前的教育过程中,当校舍一天比一天漂亮、教育技术一天比一天先进、课程内容和课程类型一天比一天多样、教育科研一天比一天红火起来的时候,学生们却一天比一天更不喜欢学校,家长们也一天比一天更怀疑学校教育究竟能否使自己的孩子得以全面发展,并由此发出“我们不跟你玩了”的决裂之音。另外,消失几十年的私塾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当然,此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基于世界发展的趋势和国内教育出现的问题而采取的战略举措,它使教育的许多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也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我们列举目前教育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并不是为了感叹“今不如昔”,更不是否定新课程,而是直面当前中国教育存在的挑战,以期寻找解决的途径和办法。坦率地讲,本次课程改革在理论上的更新和论证是比较充分的,但如何落实新课程精神,如何去操作,进而根据实施情况修正新课程的理念才是现在和今后一段时间必须解决的问题。那么我们到哪里去找一种实践的范式呢?无外乎两条路——向前人看、向前沿看。柏格理教育思想在 100 年前的“三无”(苗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起点上,在促进教育的本体功能和社会功能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个案,在新课程改革中极为缺少典型个案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整理它、思考它、研究它。我们相信,它对于我国新课程改革尤其是贫困山区的教育实践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柏格理的教育思想散见于他的日记中,也蕴含在他的日常行为

中,而这些思想又比较散乱和不系统,加上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许多当事人已经不在人世,因而我们的梳理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我们不惮于这些困难,从各个方面,利用多种途径搜集整理资料,以致于深入当地访谈,然后进行反复的推敲、斟酌和论证。我们无法保证资料的绝对准确性,也无力做到论述的系统性、完整性和严密性,但我们尽力做到客观准确。全书涉及较为广泛的论域,这对我们是巨大的挑战,我们愿意接受批评;由于对柏格理热心教育及所取得的成就的敬仰,行文过程中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不当之处,敬请谅解。陶行知说过:只有做起来才是最可贵的。这是督促我们前行的动力。作为教育工作者,不一定有满口妙语、一纸锦绣的本事,但面对成堆的教育问题和挑战,首先是要思考,要行动。只有如此,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读者如能通过阅读本书,关注这一个案,并与我们一起思考、讨论和批评,便是对我们劳动的最高奖赏。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柏格理及石门坎介绍	(1)
第一节 塞缪尔·柏格理简介	(1)
第二节 贵州石门坎简介	(3)
第二章 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取向	(6)
第一节 以人为本教育价值取向产生的背景	(6)
第二节 以人为本教育价值取向的内容	(13)
第三章 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结合的课程目标	(36)
第一节 大众教育目标的选定	(37)
第二节 大众教育目标的实现过程	(40)
第三节 大众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就	(57)
第四节 大众教育体系下的精英教育	(63)
第四章 与时俱进的课程设置	(68)
第一节 “自下而上”的课程选择	(68)
第二节 因时制宜的课程内容	(80)
第五章 “农科教”相结合的课程实践	(83)
第一节 农科教相结合的课程实践的背景	(84)
第二节 农科教相结合的课程实践所产生的效果	(85)
第三节 农科教相统一的“结合”模式	(90)
第六章 “为人的”“属人的”“人为的”课程评价	(99)
第一节 “为人的”课程评价标准	(100)

第二节	“属人的”评价对象	(106)
第三节	“人为的”课程评价特色	(110)
第七章	“波拉德模式”的校本课程开发	(113)
第一节	“波拉德”——苗文字的得名	(114)
第二节	漂亮的三重奏——“波拉德”文字的特点	(114)
第三节	集腋成裘——“波拉德文字”的创制过程	(128)
第四节	“波拉德”的创制模式	(138)
第五节	“波拉德模式”的历史功绩	(146)
第六节	破困之器——“波拉德文字”创制模式的当代思考	(151)
第七节	“波拉德模式”的历时性延续	(156)
第八章	柏格理的教学思想	(165)
第一节	三语教学的形式	(165)
第二节	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应用	(166)
第三节	“双轨制”的教学模式	(171)
第九章	柏格理教育思想的共时性扩展	(175)
第一节	20 世纪初中国教会大学背景及特点	(175)
第二节	20 世纪初中国教会大学对当今高等教育的启示	(184)
第十章	历史见证者的声音	(188)
附录 1:	《蚩尤与苗族迁徙歌》	(240)
附录 2:	石门坎教会《溯源碑》碑文	(244)
附录 3:	石门坎苗文《溯源碑》(《苗族信教史碑》)碑文	(246)
附录 4:	王建明:《现在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石门坎的介绍》	(247)
附录 5:	欧内斯特·柏格理《塞缪尔·柏格理年谱》	(250)
参考文献		(252)
后 记		(255)

第一章 柏格理及石门坎介绍

第一节 塞缪尔·柏格理简介

塞缪尔·柏格理,亦译作“波拉德”(REV·Samuel Pollard, 1864—1915),1864年出生于英格兰南海岸康沃尔·卡梅欧福特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柏格理中学时代学习成绩优异,于1881年以优异成绩通过国家文官考试,开始在克拉珀姆的邮政储蓄银行任职。1887年1月27日,作为基督教英国循道公会联合传教团的教士,与弗兰克·邵慕廉一道,在提尔堡搭乘舟山号轮船启程来到中国。1888年2月,抵达云南昭通,8月抵云南府。1891年12月,与埃玛·韩素音结婚。1892年,随传教团移驻昭通。1903年,进入诺苏地区(四川凉山)旅行。1904年传教至石门坎,1905年得到赠送的石门坎的土地。在传教过程中,多次深入苗族群众中寻访,于1906年创制柏格理符号,营建石门坎学校。1915年,石门坎一带流行伤寒病,柏格理在救治患病的苗族群众和师生时被传染,9月15日医治无效去世。

柏格理虽是洋人,但他却出身于普通的工人家庭,属于劳动阶层,因而具有与其同胞颠地、义律之流截然不同的思想感情。他痛恨鸦片贸易,憎恶在长江口横冲直撞的列强炮舰,谴责腐败的封建官吏、凶残的地主阶级,同情受压迫、被剥削的各族群众,并为辛亥革命的胜利而欢呼。

他是基督的信徒,是有神论者,然而,他从事的是现实社会的实践与改革工作,这就使他不得不关注现实社会中的问题,进而了解到当地苗族群众的生存状态,并为改变这种状态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柏格

理 1913 年 9 月 1 日在日记中写道：“只是到了现在，我才开始理解到，这些民众中的不少人正处于多么可怕的贫穷状态。我平时也知道他们穷，但却只是在此刻才体会到他们实际的贫穷程度。近来，经过了几次如同刚才我在苗族人家看到的情景后，我感到无比的气愤和棘手，难道从来就是这样吗？如果我宣讲在天国里没有财主的位置，群众可能嘲笑我们像是在另一个世界里讲话，而他们在人世到底有什么机遇呢？”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柏格理对苗族百姓疾苦的关注和同情。

石门坎地区物质极度贫乏，环境极端恶劣，可谓人间“炼狱”，但在塞缪尔·柏格理等一批西方传教士的组织引导下，各族人民尤其是苗族同胞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石门坎也成为教育中心，并被称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鉴于柏格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基督教新教的英国循道公会将塞缪尔·柏格理列为包括约翰·卫斯理在内的五大使徒之一；埃利奥特·甘铎理更是把他与拿破仑、卡尔·马克思、卫斯理相提并论。甘铎理在其日记中写道：“拿破仑、卡尔·马克思、卫斯理及其他若干人，因为他们的短暂存在而改变了历史。柏格理在中国西南的作为也是如此，他以独特的方法影响到一个时代。”（甘铎理著，东人达译：《在云的那一边——柏格理传记》）这些至尊评价是有大量的事实依据的。20 世纪前叶，柏格理、张道蕙、高志华、朱焕章等一批人，在广大苗族、彝族、汉族同胞的支持下，兴办教育，创建学校，在石门坎地区建成了以中心学校为主体，以几十所分校为辅助的教育网络，学校规模日益扩大，生源越来越广，质量日益提高，短短二十年时间，培养出了四千多名小学生、数百名高中生及中专生、三十多名大学毕业生、两位博士生。石门坎人从目不识丁到有自己的大学生、博士生，确实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要知道，这些成就的取得前后只有短短的二十年时间。另外，正是教育启蒙对石门坎民族意识的唤醒，以及学校教育培养出的人才的回归推动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在此基础上，柏格理利用集体的智慧和个人的才学、天赋和热忱，创制出了老苗文，结束了苗族同胞无自己文字的历史，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男女同校同等接受教育，实施双语教

学,推广现代体育,注重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坚持把学校办到民族地区山寨等务实的举措,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结合的体制和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和思想等等,对石门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此,外国学者对其在教育方面的贡献做出高度评价:“在两代人的时间里,苗族几乎成为贵州文化的支撑者”。(东旻:《石门坎学校创建日期考》)当然,柏格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大背景下作为一名传教士来到中国的,他的主要工作目的是传播基督教,办学只是他打开传教工作局面的一个工具。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第二节 贵州石门坎简介

石门坎,是一个苗族聚集的村寨,因为寨前有通向涧底的石阶,所以取名石门坎。这个要在五十万分之一的贵州省地图上才能标出名字的苗民村寨,地处中国贵州威宁、云南昭通、彝良三县交界处,东与云贵、龙街两乡接壤,南与黑土河相依,西北距云南昭通三十余公里,东北距云南彝良六十多公里,属贵州省威宁县,距离威宁县城 142 公里。石门坎总面积约 143 平方公里,居住着苗、彝、汉、回、布依等六个民族,约一万五千人。

过去的石门坎地势偏僻,山高坡陡,万壑纵横,崑崙险峻,且林大兽多,谷深雾浓且终日不散。冬季冰凌盖地,雪厚尺许;秋天细雨连绵,道路险恶,交通十分闭塞(1975 年才通公路)。由此可知,石门坎环境恶劣、稼穡艰难。石门坎《溯源碑》曰:“天荒未破,畴咨冒棘披荆,古径云封,遑恤残山剩水”。

石门坎的居民纯系一种花苗,俗称大花苗。苗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之一。据文史资料记载,距今五千多年前,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一带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部落联盟,与以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发生冲突,在涿鹿大战中九黎败北,蚩尤被杀。九黎部落部分融合于炎黄部落,另有相当大的部分向南迁徙。到了尧、舜、禹时期,

定居于江汉平原的九黎遗属又发展起来,形成了新的“三苗”部落联盟。华夏部落不断向“三苗”发动进攻,虽然经过长期的抗争,但是最终在禹的征伐下,“三苗”部落联盟的势力被彻底削弱,并分化瓦解,大部分离开江淮和洞庭、彭蠡之间的平原地带,避入山林沼泽,开始向西北和西南山区迁徙。周昭王对苗族部落进行过多次征伐,使得苗族先民进行了大幅度、远距离、长时期的迁徙,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到达滇、黔、川边一带。这部悲壮的迁徙史,苗族的古歌《蚩尤与苗族迁徙歌》有着较为详尽的反映:“古时苗族住在直米力,利磨城的甘骚卯毕领兵进犯直米力;蚩尤败后南迁米城,再迁小米坝,最后来到黄河边,渡河南上五次才成功,定居平坦的花椒大坝子,北方的沙昭觉堵又率兵进犯,迁徙来到底果全(湖南一带)被逼迫迁到崩崩地;再逃荒躲难来到阿止居地(今贵州大方、黔西、金沙一带)。”(东人达:《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1916年8月10日,贵州威宁石门坎光华小学苗族师生立起苗文《溯源碑》,碑文中对苗族的历史也有催人泪下的表述:“我们苗族实实际际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民族,祖先们长期住在中原地方。祖先们有歌唱道: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以后变成了荒野的人,国家和政府没有哪一个管理。”

苗族先民迁徙到滇、川、黔地区时,算是一个晚到的部族,这些地区的农田、森林、矿产等资源已为当地的汉族地主和彝族土司、土目所占有。在经济上,苗族群众没有自己的土地、树木、矿产等资源,只得租种地主、土司的田地谋生,但当时粮食亩产量只有三四十斤,他们常常是交了地主的租和还债外,几乎是一无所有。他们吃的是野菜树根,穿的是草衣和生羊皮,住的是岩洞和茅草棚,睡的是燕麦草,盖的是秧被。政治上他们成为封建地主、土目的农奴与奴隶,地主和土目随意掠夺他们的牲畜、房屋、粮食及生命,他们只是为地主、土目劳作并被随意驱使的动物而已,根本没有任何政治地位可言。文化上,苗民们没有自己的文字,没有学校,没有书籍,没有一个人读过书,二十多岁的青年数数字还不能过百,真可谓是汉字字盲、汉语语盲和数字数盲。王树德在日记中对苗民的生存状态给予了真实而形象地描述:“一代又一代的花苗人,为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而遭受痛苦,就好像不

断往返游移于汉族与诺苏之间的一叶孤舟,并被汉族和诺苏认为是大地上无所作为的一群人,只适于充当他们的农奴与奴隶。”(王树德著,东人达译:《石门坎与花苗》)由于内向和恐惧,加之被这些更为强大的邻居所包围,苗族就失去了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他们只好屈服于农奴的身份,变成领主的动产,耕种自己居住地的土地。花苗人居住在人迹罕至的、要穿过浓雾方能抵达的群山顶部,长期与外界缺乏往来,眼界狭隘,精神猥琐。他们生活在“沮丧的深渊”之中。就是在这样一个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文化地位极为低下的民族生存平台上,100年前的英国传教士塞缪尔·柏格理创造了教育的奇迹。